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实力、身份与 中美关系

● 张家栋

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外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实力对比状态；二是国际规范。实力对比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大小和范围；而国家身份，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类型，则决定了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接受程度和对国际体系的参与程度，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方式和特征。笔者一向认为，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对待过去和历史应该是乐观和宽容的，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民族自尊心，消除仇恨；对待现实应该是客观、严格的，有利因素应该加以弘扬，不利因素更应该被重视；对待未来和发展趋势，则应该是悲观、苛刻的，应该基于最不利的可能性去准备应对措施，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下面就从中美两国国力、身份的对比关系，来分析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等问题。

一、中国的国力仍然非常薄弱

国力又称国家实力，由硬国力和软国力两个部分组成。硬国力包括经济、技术和军事等可以直接度量、可以直接进行对比的部分；软国力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教育质量和文化传统等难以度量和对比的部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软国力部分对中国尚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下面主要分析硬国力部分：

（一）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亮点是近几年来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在占世界经济份额、进出口总值等方面，都开始产生全球性影响。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不断增加对中国关切程度的主要根源。但是 2004 年，中国 GDP 只居世界第 7 位，仅为美国的七分之一。^①虽然 2005 年中国 GDP 仍然可能实现 8% 以上的增长，^②但是由于中国 GDP 的基数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的绝对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

① “世行公布去年 GDP 排名中国名列第 7，相当美国 1/7”，<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0703/17011753830.shtml>

② 邱晓华：“2005 中国经济增速 8%—9%”，载《统计》2005 年第 2 期，第 2 页。

外来资本、技术和外国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也使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不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自1978年到2003年，中国共吸引了5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日本于1945—2000年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倍。2003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出口总额中占55%。但是1974—1978年间的韩国，外资企业只占其制造业出口的25%；在泰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从20世纪70年代的18%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6%。^① 据研究，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包含资本、知识和技术的“一揽子创造性投资”，平均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能拉动大约48个单位的GDP增加。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截止2001年底，在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中，70.3%属于劳动力寻找型，仅26.4%属于市场和自然资源寻找型，其余3.4%属于并购型投资。^② 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恰恰是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和廉价劳动力，这两点都不是发达经济体系所需要的指标。这种状况导致中国人对国民经济的相对部分没有自由生产、定价和转移的权力，也没有享受和支配主要利润的权力，经济发展的成果要么被转移到国外，要么是没有在国内有效流动和扩散。

另外，在国民经济中起到稳定和支柱作用的国有资产，状况也不容乐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

^① [美] 乔治J. 吉尔博伊：“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反思”，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第30页。

^② 贺红波、屠新曙：“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载《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2期，第63页。

任李保民近日在北海举行的有关国有资产产权改制的研讨会上说：在近 12 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中，只有大约 1/3 正常运转，有 1/3 闲置浪费，还有 1/3 下落不明。^① 据权威人士预测，如果人民币升值 10 个点，达到 7.2 比 1 美元左右，中国 1/3 的出口企业都可能倒闭。相比之下，日元曾经升了几倍，但是日本经济仍然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说明日本即使是在经济泡沫非常严重的时期，还是比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健康得多。

中国经济还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首先，中国外债余额不断增加，偿债负担不断加大。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5 年 6 月末，中国外债余额为 2661.76 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比上年末增加 186.84 亿美元，增长 7.5%。^② 其次，中国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国内外逃资金不断增加，构成一巨大经济黑洞，不断吞噬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国家外汇管理局做过一项专题调查，估计 1997 至 1999 年累计资本外逃 530 余亿美元，平均每年 177 亿美元。而樊纲教授则认为，仅 2000 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就达 480 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 407 亿美元。^③ 再次，中国经济开始

① “12 万亿国有资本中 4 万亿闲置浪费，4 万亿情况不清”，http://www.ce.cn/macro/gnbd/dszl/zh/200512/09/t20051209_5464610.shtml

② “中国外债余额达到 2661.76 亿美元 半年增长 7.5%”，<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1212/07342189906.shtml>

③ “资本外逃 3 年 530 亿美元”，<http://news.sina.com.cn/c/2002-09-10/1031716193.html>

遭遇资源瓶颈，资源约束将取代资本约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2000—2004年，中国石油、煤炭、钢、铁矿石和精炼铜产量分别增长了7.4%、95.8%、130.2%、39.7%和50.3%，而消费量分别增长29.5%、50.2%、141.8%、94.2%和69%，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开采生产能力的增长。^①最后，中国在国际大宗交易中一直处于被宰割的地方，无论是石油、铜还是棉花，只要是中國想买的就会涨价，中国想卖的就会跌价。在中航油事件（新加坡）和2005年伦敦有色金属交易所的铜事件背后，都体现出国际资本围剿中国资本的政治和文化动机。

有学者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因此两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改善双边关系。这个观点部分正确，但是意义非常有限。中国是被世界经济赶着走的羊，而不是一条领头的龙。从技术、资金和原料来源，再到产品销售、利润分享和资本流动，决定权都基本不在中国人手中。美国商业部长古铁雷斯曾说过：“制裁中国是美国的权力”。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与美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中国是非常脆弱的。

（二）中国对外科技依存度不断提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但是这台发动机在中国运行的状况并不良好。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

^① “权威数据指资源约束将成十一五经济发展主要矛盾”，<http://www.nbsti.gov.cn/economy/content.aspx?ID=LBAB2936-AB05B29A>

开发研究院 (MD) 发表的、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权威经济研究报告《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继 1999 年大幅下降 12 位以后，2000 年又下降 3 位，排第 28 位；2001 年排第 26 位，2002 年排第 24 位，2003 年在 51 个国家中排名第 29 位，2004 年排第 24 位^①。从多年状况来看，中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仍然处于中下水平，远远低于 GDP 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

除了上述比较简单的数据以外，其他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则更为悲观、复杂。2005 年 12 月 8 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邓楠在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说，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设备投资 60% 以上依靠进口，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 39% 左右。^② 这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金高投入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严重依赖资源高消耗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严重依赖引进技术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部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目前，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 20%，计算机售价的 30%，数控机床售价的 20%—40% 都

^① 童晓明、周丽平：“中国科技竞争力现状分析及对策”，载《浙江统计》2005 年第 5 期，第 10 页；<http://www.sohu.fr/bbs/printpage.asp?BoardID=2&ID=337>

^② “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设备投资 60% 靠进口”，http://www.ce.cn/macro/gnbd/dszl/wm/200512/09/t20051209_5465112.shtml

要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①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 30% 以下，美国、日本仅为 5% 左右。^② 就连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也指出，中国企业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和关键性元件，严重制约了他们为单方面利益而支配其科技和贸易力量的能力。^③

从 1993 年到 2003 年，中国机械工业出口额增加了近 20 倍，达 830 亿美元，但是外资企业在其中占的比重从 35% 上升到 79%；电脑设备的出口额从 7.16 亿美元上升到 410 亿美元，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从 73% 上升到 92%；电子和电信产品的出口额增加 7 倍，达 890 亿美元，但是外资企业的比重从 45% 上升到 74%。^④ 中国企业一般只重视短期效益，只愿意引进设备而不是进口技术再对其本土化。2003 年，中国企业用于科技研发的开支总共 27 亿美元，大型企业在技术本土化方面的投资不到进口设备总开支的 10%。而在 20 世

① “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设备投资 60% 靠进口”，http://www.ce.cn/macro/gnbd/dszl/wm/200512/09/t20051209_5465112.shtml。也有数据认为，到 2003 年，中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超过 300 万人，与美国、日本的人才问题大致相当，企业研发人员占总量的 60% 左右。参见：路甬祥：“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与对策”，载《中国科技奖励》2005 年第 2 期，第 49 页。（路甬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是必须对中国科技落后状况负责的人，存在夸大成绩的动机。所以笔者倾向于相信邓楠的数据。）

② 任意文：“中国科技落后的严峻态势”，载《发明与创新》2005 年第 3 期，第 17 页。

③ [美] 乔治 J. 吉尔博伊：“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反思”，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 年第 3 期，第 29 页。

④ 同上。

纪 70、80 年代的日本和韩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时，企业往往用 2—3 倍于进口设备的资金吸引技术并使其本土化。^①这使得整个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几乎都是外来资本的天下。

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不但有限，而且也没有得到有效配置。根据中国科协的调查，2003 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98%，农村居民更低至 0.7%，与美国 2001 年已经达到的 17% 的水平相距甚远；中国科技工作者 67% 集中在事业单位，17.3% 在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还有 16% 在三资企业和民办企业单位工作。^②这表明，中国的科技人才，绝大部分是被国家供养的准干部，而非活动在科技、经济生活的第一线。

（三）中国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

当代军事力量比的不是单兵作战和特种武器，而是包括武器装备、情报、指挥等在内的一个武器系统。在武器装备方面，海湾战争时期，中国对自己军事力量的总体描述是“臂短腿慢”，缺乏用于作战的运输力量，即使作战部队到达作战区域也难以对敌实施攻击，除非敌人比自己的臂更短、腿更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军事力量与美国相比仍将处于严重的劣势地位，只好通过优先发展导弹系统确保不对称的威胁力

① [美] 乔治 J. 吉尔博伊：“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反思”，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 年第 3 期，第 31—32 页。

② “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 设备投资 60% 靠进口”，http://www.ce.cn/macro/gnbd/dszl/wm/200512/09/t20051209_5465112.shtml

量，通过改进情报及侦察系统来增强作战能力。^①

在军事系统中，由卫星网络组成的情报、指挥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清楚。军事卫星情报系统具有三个基本功能：情报搜集，情报分析、综合、组织处理和传输，情报的检索、查询和应用。^②在美国于1996年3月正式颁发的《2010年联合作战构想》中，主张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美军要全面控制作战空间，包括扩大行动空间、占领制高点 and 信息控制权。将控制信息作为控制作战空间的核心要素，确保美军在使用21世纪现代化武器系统时，敌人只能使用19世纪的方式实施指挥。^③据美国一个名为“关注科学家联盟”的组织近日公布的最新全世界卫星数据库显示，目前正在环绕地球飞行的共有795颗各类卫星，而其中一半以上属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约413颗，其中军用卫星占大约四分之一，加上军民两用卫星，美国可以用于军事或间谍侦察任务的卫星总量超过了100颗，可以构成一个严密的情报指挥网络。除美国以外，俄罗斯拥有的卫星数量仅次于美国，共有87颗；中国的卫星数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三，

① 参见：“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的现状、前景、重点与困难”，载《国际观察》（半月刊）2005年1月总第435期，第12—15页。

② 鲍梅卡斯基 A.，《科学研究中的情报系统》，田义兴、潘镜海（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50—169页。

③ 在美军传统作战理论中，信息一直位于战斗力五大要素机动、火力、防护、指挥和信息的末位。参见：欧阳立平：“美国的军事战略与军事力量”，载《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5期，第2—4页。

但只有 34 颗。^① 姑且不论技术方面的差距，这 34 颗卫星即使全部用于军事侦察用途，也很难构成一个有效的情报指挥体系。中国虽然试图发展反卫星武器，但是这些武器的有效性还没有得到证实，自己卫星的防护能力也处于未定状态，尚不能作为反制美国的军事手段。^②

中国的军费开支也十分有限。2004 年，中国军费只有 256 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 2.5%，人均 23 美元，军人人均军费 1.3 万美元；日本军费是中国的 1.62 倍，人均军费 1300 美元，军人人均军费接近 20 万美元；^③ 美国 2004 年的军费开支比前一年大幅上升 12%，达 4550 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 47%，超过了排名在它之后的 32 个军费大国的开支总和，也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军费开支总和。^④ 虽然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中国以美元表示出来的军费开支出入比较大，但是考虑中国尖端军事科技和设备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

① “美国 413 颗卫星独霸太空 中国仅有 34 颗排全球第 3”，http://www.ce.cn/xwzx/gjss/gdxw/200512/09/t20051209_5468940.shtml

② “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的现状、前景、重点与困难”，载《国际观察》（半月刊）2005 年 1 月总第 435 期，第 12—15 页。

③ <http://news.sina.com.cn/c/2005-12-13/19577698547s.shtml>

④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04 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为 1.04 万亿美元。美国实际军费开支经常远远超出其国防预算。美国 2000 财年的国防预算虽为 2890 亿美元，但实际开支为 3400 多亿美元，比预算拨款多出 510 亿美元；2004 年军费预算为 4005 亿美元，但是实际开支 4550 亿美元，超支 545 亿美元；参议院已经通过 2006 年军费预算 4450 亿美元，但是按照超支惯例，可能实际开支会接近 5000 亿美元。参见：<http://news.memail.net/050608/120,1,1523434,00.shtml>；《中国国防报》2003 年 5 月 27 日第 1 版。

按照汇率计算的军费开支严重不足。

中国军事目前主要依靠导弹系统作为基本的威慑力量，同时又注重在网络战、信息战等领域与美国形成非对称性抗衡。^①近年来，美国军方热炒“中国军事威胁论”，这并非因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已经在事实上威胁到美国安全，而是试图通过这种议论影响中美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走向。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远远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不可相提并论。^②中国军事力量保卫领土安全和主权的能力可能有余，但作为拓展国家利益和战略空间的能力则明显不足。

二、中美国家身份存在很大差异

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身份。^③如果说国家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行为能力，那么国家身份就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行为方式，是除实力以外最重要的国家要素。国家身份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历史文化，这是一个国家区别另一国家最基本、最恒定的因素，一个没有文化核心的国家在世界上是不可能立足之地的。第二是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

① 美国学者沈大伟的观点。参见：方春生：“美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中国军事现代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2页。

② 张继业、陈文鑫：“美国军方缘何热炒‘中国军事威胁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第34、35、38页。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In Eugene R. Wittkopf and James M. McCormick (ed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 11.

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其不仅可以建构行为体身份，也向行为体提供意识模式。^①任何国家设计和实施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都受到国家独特性的巨大影响。^②第三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的对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程度，构成了国家身份的外部因素。^③

以“自己人”为中心看待外部世界，是人类的本性之一；热爱自己的部落、种族和以“自己人”感到荣誉，或者拒“外人”于“自己”之外，是人类的天然情感。民族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国家身份最重要特征，也是维护一个民族国家的最后防线。正是民族文化的强大力量使得中国成为数千年来最后一个、也是唯一存在的文明古国。现在，中国开始重新重视传统文化对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意义，决心在世界主要国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或孔子学院，其中的一些已经在韩国等国建立。

重视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问题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民族主义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家庭、亲属、家族等——遵循相同的逻辑，本身不存在正义与邪恶的问题。但民族主义有不同的类型：积极融入型、进攻型和自闭型。积极融入型民族主义在肯定、强调本民族优越性的同时，也深刻反省本民族的劣根性，同时又没有排外情绪，也不试图贬低其他民

①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见：高飞：“浅析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视角”，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4期，第41页。

②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London: Andre Deutsch, 1987, p. 51

③ 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

族；进攻型民族主义唯我独尊，完全否定异族文化，并试图侵略、改造其他落后民族；自闭型民族主义也唯我独尊，但因自身弱势而拒绝参与全球化进程，并且乐于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错误中发现自身的合法性，是文化愚昧和政治专制的最后护身符。中国不可能摆脱民族主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但是中国要尽量选择的是积极融入的民族主义，将民族情绪引导到正确、积极的方向上去，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同时，又不构成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交往的障碍。

目前，中国一方面受历史文化和政治文化约束，保持着传统大国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生活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中国又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弱化或转移国家主权才能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对国际机制开始采取积极参与的政策。^①

在美国方面，毫无疑问其对外政策是以国家利益为圭臬的，这种民族主义色彩与其他民族国家没有本质差异。但是美国对自己独特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身份的认知，使美国外交还具有一种强烈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色彩。构成美国身份的要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共同的历史经验以及在这一经验基础上产生的共同的文化；二是对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

^①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认为这表明中国或其领导人正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世界观。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面临着这种矛盾局面，是国际体系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参见：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4—10页。

的信奉。^① 汉斯·库恩认为,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等同于一种理念和思想的民族,“成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让自己认同这种理念”。^② 西蒙·利普塞特认为,美国是围绕一种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国家,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自由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放任。^③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也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就是一种意识形态”。^④ 在近代历史上,除了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短暂时期以外,很少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是以实现一种普世目标来确立自己国家身份的。^⑤

美国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经常为美国的“扩张”和国际干涉活动蒙上一层神圣的光环、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即使是“门罗宣言”及其以前,美国一直将排除来自欧洲的干涉视为外交的重要内容,但实际上美国要排除的也只是欧洲对“美国干涉整个美洲事务”权的干涉。所以,在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与推广自由也即扩张或国际干涉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认为,“如果美国人没有这种能超越各自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就会按照各自

① 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载《史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7页。

②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 9.

③ Seymour M.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 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h & Company, 1996, p. 31.

④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 25.

⑤ 王立新:第132页。

不同的历史处于分裂状态。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仅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的美国人……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因此，美国不能将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仅限于自己的国土范围，如果这么做，人们就会对这种价值观的普遍意义产生怀疑，并会危及这些价值观在国内的信誉。”^①

因此，与一切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家一样，敌对目标和危机状态对美国维持其国家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从建国伊始，美国就是在与一个不受欢迎的“他者”的比较中构建其国家认同的，这一“他者”被界定为自由、民主和共和制度的反对者。在建国初期，“他者”就是代表着腐败、专制和贵族政治的英国；在19世纪，美国则一直在与暴政、君主专制和帝国主义欧洲的对比中界定自己的国家身份；到20世纪，希特勒德国、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成为自由的敌人、美国人心目中的“他者”。所以，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使美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更需要一个对立的“他者”，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意识形态来保持团结和凝聚国民。^② 冷战结束以后，就有美国人发出疑问：没有了冷战，作为美国人的意义是什么？^③ 寻找“他者”的政策和努力，在很多情况下使捍卫自由成为美国保护和

①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中的台湾、西藏和香港问题”，收入埃兹拉·沃格尔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中美关系》，田斌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② 王立新：第135页。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In Wittkopf and McCormick (ed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 merican Foreign Polic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 12.

开拓利益空间的旗号，使伟大的普世主义理想不自觉地演变成霸权主义政策。

表 1: 中美国家身份比较

| | 历史文化 | 政治文化 | 对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 |
|----|----------|------------|---------------------|
| 中国 | 天下观，普世主义 | 意识形态化，独特性 | 有选择地参与、合作、影响，强调独立性 |
| 美国 | 天定命运，独特性 | 意识形态化，普世主义 | 主导、影响，强调在必要情况下的行为自由 |

中国是被一种共同的历史感塑造起来的，而美国则是被现实使命感塑造起来的。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身份冲突，从近期来看，是两种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中国目前更加强调的是独特性而不是政治文化的普世性，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已经非常有限；在历史远期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美冲突在本质上是中國历史文化中的“天下主义”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普世主义”之间的冲突，这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两种异质文化的错位。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视天下为一体的理念，事实上中国在古代东亚体系中一直享有这种地位^①，使得中国非常容易接受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并倾向于在思想上将自己定位为“世界”的中心和领导者。所以，中国人对美国式“普世主义”及由此

^① 这方向内容可以参见：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第 34—41 页。

产生的“霸权主义”的排斥和抗拒心理，是由衷的、具有历史渊源的。

三、中国融入国际体系^①的必要性

体系(system)一般指由若干个互动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整体。按照吉尔平的定义,国际体系是以近代主权国家为其最重要组成因素的非主体型社会,在经济上形成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某种分工体制,是一种通过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而联结在一起的多样实体的集合。^②国际体系虽然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两大部分,但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体系,大国和霸权国家是其核心内容,国际组织、条约、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其表现和载体。

(一) 西方体系是当代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体系就是最有生命力和侵略性的体

^① 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创立了国际社会概念,认为国际社会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和结果,而国际体系则是条件、源泉。但是国际社会过分相信和依赖规范、理性的大国间均势和统一价值观等力量,无法构建和反映现实力量关系。(参见:刘鸣:“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评价”,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第54页)另外,在本文中,国际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国际组织、规范、条约等)组成的。

^②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系。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梅特涅体系）、俾斯麦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后体系，其本质都是西方体系在受到较少外部影响情况下的自我演变，而所有不属于这个体系的国家，不论是强大的、拥有大量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中华帝国（清王朝），还是那些弱小的、尚处于封建社会阶段或原始社会阶段的亚非拉国家，都被这个体系摧毁了。苏东体系崩溃以后，对西方体系最强大有力的一次挑战也结束了。而根据另外的标准，苏东体系这个挑战性力量，也是在西方体系内部生成的。虽然领导核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但是西方体系仍然是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质内容，当代国际体系仍然是美国主导的、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正由以国家主权平等权为基础的传统权力竞争形式转向在强权支撑下的西方自由主义主导的形式过渡。随着北约东扩的落实和科索沃战争的发生，单个超级大国将不再是一种短暂或特殊化的历史现象，而成为转型后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①

（二）国际体系具有强大的建构功能

虽然对国际体系或国际机制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是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和学说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国际体系（机制）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首先，虽然现实主义者仍一致认为，国际机制及其运行规则、目标和影响总体上反映了系统内最强大国家

^① 刘鸣：“当前西方式的国际体系扩展的重点及其特点”，载《国际观察》2001年第1期，第21页。

的利益,^① 但是国际体系的标准、规则和程序能够吸引弱小国家顺从霸权国的利益,使霸权“合法化”,被认为是“自然的”或“恰当的”,^② 霸权国家因此能有效防止弱小成员采取单边行动。这表明至少对霸权国家和大国来说,国际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其次,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为国际体系能通过降低获取其他国家能力与合作意愿信息的成本来帮助提供这些保证,并保证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可以有效地持续下去。再次,国际体系可以改变成员国内部掌权的精英阶段的成分或构成方式,并逐渐改变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与偏好。国际机制可以独立地影响国家行为,通过自身的技术官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可以成为标准与规则的积极倡导者,并主动在成员国中间宣传这些标准与规则。^③ 加入某一国际组织往往要求一个国家建立加入某个组织所需的机关与官僚体制,这样就在这一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产生一个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利益取向的群体。这一群体在国内是以国际组织的身份标识自己独特性的,而在国际组织中又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中国加入 WTO 的谈判过程中,就在中国国内培养了一大批亲近 WTO 规则和知识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最后,加入国际体系可以约束国内短期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危害,有利于稳定一个国家的内外

① [加拿大]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12 期, 第 22 页。

②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 3 (Summer 1990) .

③ Michael N.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The Politics, Power, and Path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4, Autumn 1999.

政策。^① 由于强大的国家也能从国际体系中获益，也会有限制自己权力和行为的制度性动力，军事力量的效用就会降低。

虽然除了建构主义以外，绝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者都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客观存在和国际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但法理学说得对，有社会就有法。^② 国际体系不仅仅拥有一些机制和规则，也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在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一般都倾向于追随或学习地位最优的国家或霸权国家，这一方面使自己变得更加安全，另外也使霸权国家或优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交资源。在经济全球化、安全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国家利益逐渐不是由本国的意愿认同、而是根据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的理解来定义的。这就像美国学者玛莎·费丽莫 (Matha Finnemore) 所认为的，“利益并不是‘放在那儿’等着去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③ 既然国家利益必须在国际体系得到辨识和实现，就不得受其他国家偏好和国际规范的作用与制约。^④

① 新生弱小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加入某几种国际组织来加强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和信誉。See Jon Pevehouse, *Democracy from Abov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Ph. 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1). 本文见于：[加拿大]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第24页，注3。

② 李浩培：《李浩培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75页。

③ [美]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参见周海生：“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4期，第62页。

（三）融入国际体系是中国发展发展战略的唯一选择

从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是这个国际体系掠夺、侵略、蚕食、干涉、孤立、拉拢或防范的对象，一直不是这个体系的平等成员，而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表明，无论这个国际体系是正在多极化、全球化、霸权主导还是处于霸权之后，中国都不可能置身于这个体系之外。

首先，国际体系具有自主的结构选择功能，可以使体系内国家受益，体系外国家受损。虽然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主要异己者身份出现的，是国际社会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方面防范的对象。历史和现实中所有的强国和富国，都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比较类似的国家。100多年前闯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和目前最富强、最有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八国集团”，只有奥匈帝国解体被加拿大取代了地位，其他成员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和法国七个国家，虽然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相互间也有过敌对史，但是这个强国俱乐部的构成是非常稳定的。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现象即将因为中国而终结的可靠证据。中国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整地融入到国际主流社会，一定要解决“国内的政治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的接轨问题”，才能改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竞争力，避免与国际体系对抗的危险。

其次，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受益还是受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置身于国际体系之外。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与国际主流社会对抗的弱势国家可以发展、壮大。只要中国的

战略目标是和平发展，就必须参与、融入、影响国际体系，就要参与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范和国际习惯法准则，并在参与中促使国际体系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成立之初曾经实行过保守的外交政策，但是并没有与国际体系绝缘；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美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时候就开始了，并且发展速度很快。1977 年时，中国所参加的各种类型（全球和地区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只有美国的 25%、印度的 30%、世界平均值的 70% 左右。但是到 1996 年，这些比例上升为美国的 70%、印度的 80%、世界平均值的 180%。而就 37 个全球性政府间组织来说，2001 年以来，中国参加了 31 个，美国参加 33 个。^① 仅仅从数量上看，中国对这类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已经达到美国的 9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动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获取国际利益、搭便车、提高国家形象，到目前主动地、有意识地利用国际机制为中国的安全利益服务，并将广泛、深入地融入国际体系视为处理中美关系的一种重要外交战略。

再次，融入国际体系，有利于弥补中国与世界主流国家之间的差距。国际体系虽然包括多种内涵和意义，但是其最重要的部分则是由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流国家组成的强国俱乐部。主流国家指世界上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国家及其在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方面被这些国家接受或承认的国家。具体

^① 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7 期，第 5 页。江的数字中没有包括中国已经加入的 WTO，作者在这里做了修正。

来说，也就是“八国集团”（G8），最多还可以像佐立克那样加上俄罗斯和印度。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经济、文化或意识形态等方面或许有中国可以借鉴、学习之处，但都不是中国可以进行比拟的参照系。

与主流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军事力量不强、民族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并且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与主流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差异，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一个重要的阻碍性因素。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都很落后，远远不具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条件；但是中国也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很落后，但是中国又是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中国不拥有美国那样超强的力量，能够强有力地影响或左右国际体系，而是要尽量适应这一主流体系，避免与这一体系对立和竞争。即使是美国，也不拥有完全主导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能力。中国不是苏联，虽然与西方主流国家有差异，但是不能、也不想做西方国家体系的挑战者和竞争者，而是要从这个体系中获益。

最后，融入国际体系还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无论一个国家要成为霸权国家、世界大国、地区性大国还是国际体系“平静”的参与者，它都必须首先做一个为国际主流国家接受的国家。历史上的霸权国家或主导国家，无论是西方的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苏联、美国，还是古代东亚体系中的中国，其力量来源都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具有在国家边界之外推广文化的能力，还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本身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以前，中国一直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表

明中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不满。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加入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逐渐认可了现存国际体系，认为自己是一个“参与者、受益者和维护者”。现在，很多中美学者都认识到：中国已从国际体系外的、挑战型的、革命性的国家，逐步转变成认同并主动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维护现状的国家。^①中国将融入国际体系视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措施，试图借此缓和、稳定、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以开放促改革”，促进国内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

四、国际体系中的中美关系

中国选择融入国际体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战略转变。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目前国际体系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家。不处理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地融入国际体系；而不融入国际体系，也不可能积极地应对来自美国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相对弱势的中国来说，对美政策无外乎以下三种可能：追随、独立或对抗。对抗在很多时候是收益最高的一种方式，但在全球化时代，各经济体相互依存的程度提高，对抗的成本对双方来说都变得非常昂贵，对弱势的中国来说更不可取；独立也即自闭，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已被证

^① 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52页；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明不可能。这样，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政策就是追随，需要讨论的是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的追随。中国制订外交战略的依据不是未来的实力和地位，也不是理论和逻辑，只能是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比较“体面的追随”政策，可以使中国减少乃至避免与霸权国家的直接对抗，降低和平发展的成本。事实上，中美建交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在关系美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阻挠过美国。在安理会中，中国经常亮起“黄灯”投弃权票，希望美国谨慎缓行；而不是点燃红灯投否决票，与美国直接对抗。

“体面的追随”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所有国际事务上都顺从于美国的意志。美国是一个利益涉及全球的霸权国家，它受到的挑战和冲击也来自全球很多角落，包括从常规到非常规、从合法到非法很多方面。但是中国却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地区强国或世界大国，面临的问题也只是局部的，在数量和种类上不能与美国相比。所以，即使中美力量比是2:8的不对称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事务上都根据2:8的比例服从美国的意志，而是在大部分国际事务上配合、默许或不阻挠美国的同时，在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要求美国的配合或默认。所以，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实力状况使得中国实行追随政策是最有利的，但是中国的身份又使得这种追随政策只能是有限度、有选择、相对独立的。

但是，随着剩余的体系外大国，特别是中国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体系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从而构成某种封闭状态。这时，国际体系扩张所带来的正和游戏将向零和游戏转移，那时的竞争将更加激烈。20世纪初，列宁和麦金特都发现了这一点，殖民体系扩张的终点最终变成殖

民大国大规模冲突的开端。^① 所以，在西方体系强势的现实之中，当中国处于体系之外的時候，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其实只是概念意义上的；当中国开始融入这一体系时，这一变化本身会使美国所主导的体系更加安全，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当中国真正成功地学习美国经济模式、并最终在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成为世界体系一个合格^②成员时，美国霸权将面临实质意义上的挑战。^③ 这样，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发展方向之中，潜伏着共同的危机，这将是非常考验两国人民和领导人智慧的。

① 参见：[英] 巴瑞·博赞 (Barry Buzan)，“世界历史的分期与国际体系的演变”，刘德斌译，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第7页。

② 合格包括经济发达、政治进步和文化繁荣三个指标。

③ 在这个意义上，适度保持中国的敌对身份和有限的发展程度，似乎对于美国霸权是最有利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牛海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蕴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赵可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信 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夏立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